

跨国集体维权与“回飞镖”效应*

——基于美国福州移民的个案研究

黎相宜

摘要: 在社会运动与跨国倡议网络理论的基础上,以美国福州卞村移民的一起跨国集体维权为个案,探讨国际移民的“回飞镖”维权模式的形成过程与发生机制。与典型的回飞镖模型不同,卞村移民的维权框架整合经历了本地动员与海外移民介入的双向互动过程。而且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框架,行动者较为谨慎且富于策略性地运用 NGO 与媒体,以海外华侨华人的特殊身份,利用与祖籍国的政治同盟关系,最终通过杠杆政治迫使相关利益主体做出让步,从而达到维权诉求。

关键词: 跨国集体维权;回飞镖模式;福州移民;征地

中图分类号: D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15)04-0151-08

一、问题的提出

早期社会运动兴起于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但在 20 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交通、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全球性公民社会和社会网络迅速扩张,促使原本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向跨地域、跨国界的趋势发展,从而形成全球性社会运动或跨国社会运动(赵鼎新 2006:293)。跨国社会运动的形成、传播及发展与传统社会运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对本地地区公众的压力反应迟缓或消极时,尤其当国内行为体的诉求渠道被堵塞时,这些行为体会绕过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压制,通过国外渠道向本地的上层决策者施加压力;同时国际社会中的跨国行为体很可能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利用杠杆向相关国家和政府施压。这种迂回式的运动形式被称之为“回飞镖模式”(Keck & Sikkink, 1998)。后续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跨国倡议网络的形成、跨国社会运动尤其是跨国劳工运动进行研究,并试图进一步修正已有的回飞镖模型(Xu, 2012; Armbruster, 2005; 韩召颖、高婉妮 2012; 黄岩 2011)。

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非政府组织等跨国行为体在跨国社会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忽视了国际移民作为国际舞台中另一个重要行为主体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且因某一议题或结成的跨国倡议网络不仅存在于城市的劳工运动中,也显见于一些农村或近郊地区发生的反征地运动。事实上,正是因为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国际移民,导致了该地区的征地活动由于国际移民的参与或受其影响而呈现出跨国化特征。以中国东南沿海流向海外的华人移民为例,他们的祖籍地受到本地城市化发展、土地价

* 收稿日期:2014—11—1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融入模式研究”(GD13YHQ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作者简介:黎相宜,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讲师(广州 510275)。

值飙升的影响,不少近郊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征收。一些海外移民为了争取自己及亲属的切身利益,积极开展跨国集体维权活动。这在侨乡并不鲜见的现象却为以往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所广泛忽视。

同时,这些维权活动也很难为以往的相关理论所解释。近年来国内因农用征地引发的农民集体行动越来越引起关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日常反抗”“法权抗争”“规则模式”“依势博弈”“理法抗争”等概念,为理解农民的维权行动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框架(折晓叶,2008;郭于华,2002;李连江、欧博文,2008:17;于建嵘,2004;董海军,2010;覃琮,2013)。但侨乡的反征地行动由于受到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呈现跨国化的特征,其在维权逻辑、框架整合、策略选择及目标制定上均与在单一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维权活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以往的一些概念和框架均需在新的情境下重新审视。

基于此,本文在结合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与新兴的跨国倡议网络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以美国福州卞村移民的一起跨国集体维权为个案,考察这种现象的形成过程与发生机制。具体探讨以下相关问题:这些国际移民如何进行跨国集体维权的框架整合与形成跨国倡议网络,并绕过基层政府的压制向目标行为体施加压力,最终产生“回飞镖”效应?本文将采取跨国多点民族志方法,田野调查地点主要在福州卞村,及美国纽约唐人街的东百老汇大街、布鲁克林区的第八大道等福州移民聚居区^①。具体搜集材料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②。

二、维权框架的初步构建与整合

框架理论认为,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在成员内部产生能够被共鸣的意义,以便起到对个人和集体总结经验 and 指导行动的作用(Snow et al.,1986)。传统的回飞镖模型主要强调跨国政治活动家的关键作用,但忽略了本地动员的情况,也没进一步讨论倡议网络内具体行动者之间尤其是本地行动者与跨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下面笔者将分析美国福州卞村移民的跨国集体维权框架的形成过程。

(一) 多元利益主体与内部分歧

卞村属福建省福州市S镇辖管,全村耕地面积1180亩,人口2111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内就有大量村民到美国务工。目前旅外侨胞1000多人。这些海外务工者虽然远在海外,但在家乡人眼里,他们从未丧失村内的成员资格。每年村委会在移民回来较多的清明或春节开一次华侨联谊会,向移民报告村内的大小事务,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侨资,但也间接地使移民树立了对于村内事务的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海外移民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卞村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甚至由于其“美国客”的特殊身份还拥有一定的决策权。移民与卞村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依赖与互惠关系,为这些移民在随后跨国集体维权中的话语权与领导权的形成做好了铺垫。

2010年初,福州地方政府因建设学校新校区需要,决定征收卞村的部分林地。由于不少村民的祖坟位于林地上,地方各级政府决定将林地上的坟墓迁移到附近的公墓,并在村内贴出迁坟公告。此次征收坟地不仅直接影响到本村村民,也牵涉到卞村海外乡亲的利益。其中以在纽约生活居住的王立彰、俞康、郑兴财等人代表,他们认为迁坟会破坏风水,影响到移民在海外的生活。同年3月,王立彰等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村级联谊会,多次向分布在美国东部的卞村移民发起倡议,以期能有效地动员海外乡亲参与到反对坟地征用的活动中去;与村委会及镇政府进行沟通,但交涉未果。反对迁坟的移民与部分村民也试图进一步构架出维权框架,以沟通与协商的方式统一村内的分歧,以吸纳更多的支持者。但维权框架的整合过程并不顺利:一些国内村民认为只要有赔偿,将祖坟迁进公墓是可以接受的;另一些村民

① 2011年7、8月,笔者完成了在福州的田野调查;2011年11月—2012年1月在纽约完成了海外田野调查。

② 由于本文主要从海外移民的视角来探讨跨国集体维权行动,所以使用的文本资料主要来自对海外移民以及普通村民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缺少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直接调查。因此在分析材料时,笔者试图通过多种材料的佐证,尽量避免可能的偏见和夸张。文中所涉及人名、地名、社团名等均做了匿名化处理。

得到海外乡亲的授意,采取“拖时间”的博弈策略,以实际行动拒不迁坟。可见,跨国集体维权由于牵涉对象广泛、成员立场差异较大,其维权框架的整合过程与各个行动主体间的互动更为复杂。由于村民内部没有达成共识,无论是否同意迁坟的村民都未有实际的迁坟举动,地方政府无法顺利地展开迁坟征地的的工作。随后双方陷入胶着,事态一直维持到2011年6月中旬。

(二) 上达渠道堵塞与框架整合

2011年6月初,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完成拆迁,派驻工作人员进村逐家逐户让村民签字,承诺每亩地补偿7500元。这个补偿标准并未明显违反2011年5月福州市政府公布的征地补偿标准的规定。但村民认为,征用土地上种有果树及其他农作物,土地补偿价格应按果园和其他经济林地而不是现在的非经济林地计算,补偿费用在每亩10450—21600元左右。补偿标准的偏低让原本愿意搬迁的村民产生了疑虑。对于另一些根本就不想“卖地”的村民来说,“刁难”补偿额度则是对抗征地的一种权宜性表达。此外,有不少村民指出,征收工作队在丈量土地时,将五分地只报三分地,并以代签或恐吓等方式逼迫不愿签字卖地的村民完成征地任务。这都使村民对于工作队所采取的方式心生反感。

由于征地工作进展缓慢,对于村民多日劝说无效,政府决定以强拆的方式执行。2011年6月28日上午,S镇派出所出动警车、警员进驻工地,准备启动三部大型勾土机强制施工。卞村自发派出160多名村民极力阻拦,工程无法如期执行。两天后,镇政府再次试图采用强制手段暴力施工,引起卞村村民的激烈反抗。至此,村民直接与基层政府的沟通渠道基本堵塞:村民的意愿无法上达,基层征地拆迁的意图也无法落实。

在发生上述一连串事件后,卞村村民与村委会、镇政府的对立情绪已经蔓延,原本有些同意搬迁的村民的态度也开始动摇。基层政府的强硬表态和行为间接地为维权框架的内部整合提供了契机。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外移民很快采取了信息政治策略,利用国内亲人传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包装和架构,大肆批判村委会及镇政府的暴力行为。俞康撰写了《卞村主干与S镇干部强占土地,暴力镇压村民罪行纪实》,并传回家乡,作为村民的民意表达。具体内容如下:

福州市职业学校要建在卞村农民生产用土地上,占用田园农田保护区地260多亩……温家宝2011年4月考察山西吕梁时指出:修路建房不能乱占耕地。卞村主干与镇干部投机取巧,欺上瞒下……用手段假代签骗群众耕地,剥压群众生命。2011年6月28日上午卞村书记高斐、村长林耀时配合镇长陈元、副书记林冠应等带动社会打手周立美等30多人,镇派出所出动警车三部,警员十多人等几十人坐镇工地,工地大型勾土机三部动工。占用农田耕地只给村民补偿款每亩7500元,这与福州市2011年5月7日公布征地补偿款相差甚大,卞村强烈抗议,自发160多名村民阻止工程动工。经过一番力争,村民轮番守护,出于公愤和村民强大压力,工程无法如期执行。据云,当天中午,卞村委设在珠湖龙潭山庄酒家六桌大酒宴招待干部和社会打手。现在卞村四个生产队,冒着生命危险,守护耕地,为防止暴力流血事件发生,恳求各级相关领导密切注视,惩罚肇事干部。学校向卞村园地及耕地占用260亩,到底国土厅有无审批,请上级来查明。

尽管俞康已在美国二十余年,但其表达诉求的思维习惯还明显带有农民的特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都是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政策语言框架内进行思考的(于建嵘,2004)。因此,《纪实》的表述虽稍显欠缺逻辑,但并没有脱离农村基层的“反贪、维权”的主题。它得到村内70多位村民代表的签名、表态与认可,意味着海外移民与国内乡亲基本达成了“反对征地及迁坟”的共识。这标志着由卞村海外移民所主导的跨国集体维权初步完成了其框架整合。

三、重构议题与倡议网络的跨国化

框架整合后的首要任务是将信息多渠道传播出去。下面将分析框架建立后,海外移民是如何策略性地动用象征政治,为跨国倡议网络的扩大、争取更大范围内的合法性资源奠定基础的。

(一) 象征政治策略与议题的重构

不同于国内的国情,跨国倡议网络面对的是不同制度与文化情境。跨国倡议网络运动的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架构所关注的问题,利用符号或故事,通过对于象征性重大事件的解释,赢得民众对问题的注意和支持,促进有关议题的跨国化发展。这被称之为象征政治策略(凯克、辛金克 2005:19)。2011年11月,王立彰等人利用其华侨的特殊身份,以海外侨团——美国闽中联合总会的名义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发了一封“上访信”,并抄送给福建省侨办、福建省廉县县长:

……我们收到卞村委会“迁坟通告”,并根据家乡广大乡亲纷纷来电反映,这种举动已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引起村民强烈不满,一致认为这是镇政府、新区建设工作指挥部、卞村委员会及开发商等私自勾结,无视党犯国法,亦无福建省、福州市有关政府部门的正式批文,明目张胆地巧立名目,以“因福州市某某学院项目建设需要”,强迫广大乡亲迁移坟墓,实质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串通一气,而中饱私囊。我们都是爱国爱乡、遵纪守法的华侨。在美国艰苦奋斗、身心俱疲,祈求祖先保佑安居乐业,是我们精神上的支柱。但据“迁坟通告”,搬迁坟墓有1000座,我们全体旅美华侨之祖先坟墓都在其中,并规定要在短短15日之内搬迁完毕,逾期未搬迁的,按自动放弃搬迁及无墓主处理。如此急迫时间,无非是刁难我们,况且通告中亦无提到赔偿之事。更卑鄙的是,卞村某些干部唆使家乡不明真相的亲友以代签名的形式,来达到他们的阴谋诡计,是可忍孰不可忍。卞村某些贪官与社会帮派狼狈为奸,采取威胁恐吓的粗暴手段,强迫乡亲迁坟,民愤极大。为此,我们恳切请求领事馆予以大力支持帮助,则不胜感激之至。

上访信首先试图将事件问题化、污名化,将政府的征地行为定义成“贪污腐败”“强拆暴行”,并给予道德与法理上的严厉谴责,随后阐述爱国华侨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的正当性,最后再次指责土地征用方,并将其建构成对弱势村民施暴的形象,使“弱势农民需要帮助”的议题凸显出来。这起由海外移民所主导的跨国集体维权的议题既是道德议题,也牵涉到制度公正的问题。但上访信更多是以道德的叙事逻辑展开。这与移民来自乡土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在熟人社会中,“合情合理”是个体为人处世的原则,“情理”是优先于“法”的。尤其当民众向国家和政府要求正当权利时,对道义的重视往往超过了对法理的强调(覃琮 2013;黎相宜 2009)。卞村村民及海外乡亲首先指责的是对方“不讲理”,尤其是不合他们经验中的“情理”,而不是“违法”。

近年来土地征用问题与基于利益表达的集体行动在各地时有发生,如果仅以“维护弱者利益”作为议题难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为了避免政府及民众“见怪不怪”的心理,使其维权行动引起重视,移民还试图把一个弱势群体维权的事件重新架构成“涉侨”的议题,利用其华侨华人身份获得舆论支持。

(二) 倡议网络的扩大化

象征政治策略为跨国倡议网络的扩大奠定了前提。从2011年11月中旬开始,卞村移民通过在海外华人社区的社会网络,四处奔走反映,并游说华人社区内的侨领给予支持。但作为普通移民的王立彰明白,如果要顺利解决此事,需要一位在美华人社区及福建地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侨领作为“客观”的“第三方”给予道义支援,不仅能为维权争取合法性资源,还能扩大跨国倡议网络的辐射范围。

福州公会主席郑时刚成为王立彰等人寻求帮助的理想对象。郑时刚十几岁时来美,目前跟哥哥在唐人街内经营一家比较大型的餐馆,在中国国内也有多项投资。兄弟俩与美国当地主流社会的华人政客及中国各级领导长期保持密切往来。郑时刚在福州公会内不少事务的跟进都依赖于王立彰,两人平日的关系十分密切。此事如果能够成功,不仅能彰显郑时刚作为侨领的社会地位,也能使其频繁接触到祖籍地的地方官员,有利于他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与在移居地的发展。郑时刚的加入为原本影响力较弱、组织松散的跨国倡议网络提供了一剂强心针。郑时刚应承支持此事后没多久,就积极与王立彰等人筹划如何先获得来自纽约福州人社区的同情和支持。当时,多个福州籍社团准备就某侨领选举贿选被逮捕一事举行会议磋商。福州籍侨团众多,平常各自为政,少有往来。在此之前,王立彰等人虽多有奔走争取支持,但卞村的征地事件极少为社区内的其他福州人所知。郑时刚认为,此次会议是纽约福州侨界

的一次难得的聚会,可以利用此机会获得其他福州籍侨团的舆论支持。由郑时刚授意,王立彰等人草拟了《美国福建全体华侨华人关于保护海外乡亲在家乡的私有财产之声明》:

我们华侨华人是漂洋过海、浪迹天涯的一群,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心系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祖国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祖坟和祖屋是维系漂泊海外游子心系家乡的根,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联系的重要精神纽带。但近年来,在我们的家乡福建,有一些地方的开发商无视党纪国法,挟开发房地产、筹建大学城等开发建设之名,时有发生强迫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广大乡亲迁移坟墓、侵占祖屋或者是侵占其他私有财产的情况。如果未经我们同意,擅自地侵害我们在家乡的祖屋、祖坟及其他私有财产,不但严重伤害了我们广大海外乡亲们的心,而且还会粗暴地把我们与祖国、家乡联系的文化之“根”给切断了。因此,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我们将尽全力保护海外乡亲在家乡的祖屋、祖坟及祖产,为加强海外乡亲与家乡的联系,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贡献而尽绵薄之力。

声明并未明确提及卞村土地被征收的事情,而是联系其他侨乡土地被征用的情况,将此类事件象征化,并将其转化为“保护华侨华人私有财产”的议题,以此获得广大华侨华人的“移情”。声明还多次提及具有文化遗产与作为联系母国纽带作用的祖坟、祖屋,将其参与者塑造成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角色,从而顺利占据道德制高点。此声明在社团集会上一经发出,就获得了不少侨团及侨领的签字支持,使原本局限于一村的事件演变成纽约福州人社区所关心的公众议题,很快就传到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为此领事馆还专门派官员来社区了解详情。

至此,维权成员在框架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对于议题的重构与跨国倡议网络的扩大化。与以往的跨国行动者不同的是,郑时刚等人只将维权议题在一定范围内有限传播,确保所在的华人社区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知悉此事,并未进一步将信息完全公开化(比如披露给美国的NGO组织、媒体等)。这种不“越线”的谨慎处理方式,为后面杠杆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四、杠杆政治与“回飞镖”模式的形成

杠杆政治是指利用强大行为体影响网络中较弱成员无法发挥影响,从而使目标行为体改变原有做法,在整个维权中起着关键作用。下面将分析维权者如何运用杠杆政治,最终产生“回飞镖”效应。

(一) 杠杆政治策略

郑时刚长期与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及中国各级官员接触,对于中国尤其是基层的政治运作有一定了解,深谙如何运用策略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他认为如果利用侨领的身份“越级上访”,很可能微妙地改变各方力量的配比,以使态势向己方倾斜。2011年12月10日,郑时刚重新整理了王立彰等人的“上访信”,并以福州公会主席的名义分别寄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及福建省侨务办公室:

……本人是美国福州公会主席郑时刚,是2007年中华海外联谊会青年研修班第一期学员。在北京学习期间,我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于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怀。我与诸同乡是漂洋过海、浪迹天涯的一群,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心系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祖国的和平与稳定,加强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我所领导的美国福州公会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贡献绵薄之力。我本人的得力助理王立彰先生,是福州公会外交部部长,爱国爱乡……最近家乡发生一些事情,大概两年多前,由福州市*学院计划在卞村开发新学区……开发方无视附近有一千多座村民的祖先坟墓。在事情还没有完全协调好的情况下,于2011年6月28日,由镇长陈云贞指使下联同派出所一些人员,更配合当地黑社会分子以强硬手段,出动五架推土机进入卞村想进行推土工程。村民知道后,有的奋不顾身躺在路中间挡住推土机经过。广大村民为什么这样做,第一为保护祖先坟墓,第二工程工地中有丰富矿石资源……希望你能将情况上报领导,进行了解真相。

与“上访信”相比,郑时刚此信更具逻辑性与策略性。在信的开头,郑时刚相当巧妙地表明其爱国侨领的身份,并强调自己作为福州公会主席在组织社团成员、迎接祖籍国国家领导人来访、抑制海外反华势力、维护国家和平统一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由此为他的“申诉”奠定了可协商与沟通的前提。紧接着,郑时刚提到跨国集体维权的领导者之一王立彰,强调其对于祖国家乡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在上述背景铺陈完后,郑时刚详细阐述了卞村所发生的具体情况,还有意无意地向熟识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官员及福州地方官员透露“将要写信给统战部甚至给中央领导”的消息。郑时刚此举是整个回飞镖模式形成的关键一步,并对整个跨国集体维权的效应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回飞镖”效应

在此次跨国集体维权中,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行为体是国家、省级政府及中国驻外领事馆。当前中央与地方合法性配置关系呈现出中央合法性强而地方合法性被严重削弱的局面(覃琮,2013)。镇政府及村委会对来自上级行政部门的压力具有脆弱性。基于华侨华人与中国所形成的历史传统及发展经济与政治统战的现实考虑,中国政府及相关的侨务部门强调“将促进侨胞事业发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保障和改善侨界民生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回应侨胞合理合法诉求,推动制订涉侨政策法规,协调敦促有关部门维护侨胞权益”^①,涉侨议题很容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郑时刚等人绕过相关利益主体向中国驻外领事馆、福建省侨务部门反映情况的杠杆政治很快显出其有效性。2011年12月底,福建省侨办分别从中国驻美领馆与郑时刚两个渠道收到“上访信”后将其转发给县政府,责其了解并解决。2012年元旦刚过,镇政府就派人与郑时刚等人沟通表示迁坟之事可再协商。此时郑时刚的态度也有了策略性的变化:

他们说搬迁坟墓,他们来赔钱。我说不是就给钱的问题,你几个亿的项目,如果说我只要是一点小钱的话,我们干嘛大费周章地搞这么多事情,我肯定是要讨价还价的余地啊,不是说你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啊,肯定是要钱,但就看他们能够拿出怎么个诚意来。^②

虽然郑时刚表示“不是给钱的问题”,但他明白如果还坚守“不迁坟”的初衷,很可能导致矛盾激化,丧失让事情顺利解决的契机。既然迁坟无法避免,适当“对抗一下”,为己方争取到与征地方讨价还价的空间是最有效的维权策略。2012年1月中旬,地方政府及开发商直接联系王立彰等人,请他们回去私下协商坟地的搬迁地址及赔偿价格。同年清明,王立彰、俞康等人回乡与当地政府及开发商协调赔偿及迁坟事宜。最终卞村村民及海外移民均同意征收坟地,但条件是可以自主选择公墓或另择坟地,费用由征地方承担。村民根据坟墓的个数与面积计算获得从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赔偿。其中,维权的主要领导者王立彰及其家人是实际的最大获益者。王立彰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坟墓一共6座,获得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至此,郑时刚、王立彰、俞康等人组织的跨国集体维权成功地产生了“回飞镖”效应:他们通过施加给福建省政府相关部门、中国驻美领事馆的道德杠杆,顺利撬动卞村村委、镇政府及开发商,使其转变态度并允诺提高赔偿额度。在此次跨国集体维权中,海外移民不仅获得物质补偿,还无形中抬高了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作为利益相关之外的郑时刚在整个跨国集体维权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他积极利用“侨领”的社会身份及政治网络,使事情峰回路转,而维权的胜利成为突显其社会声望与社会影响力的资本,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地方官员的接触,为其在国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美国福州移民的一起跨国集体维权为例,试图探讨国际移民的“回飞镖”维权模式的形成与

^① 参见 http://dfoca.hainan.gov.cn/wsqbzw/toutiao/201403/t20140322_1175779.htm。

^② 2012年1月3日,笔者在纽约唐人街福州公所对主席郑时刚的访谈。

发展。文章讨论了维权成员如何绕过村委会、镇政府及开放商的压制,利用“华侨华人身份”通过中国外交部的派出机构——领事馆及本地上层决策者——福建省侨办及县政府,迫使本地利益主体从原来的强硬态度改为协商态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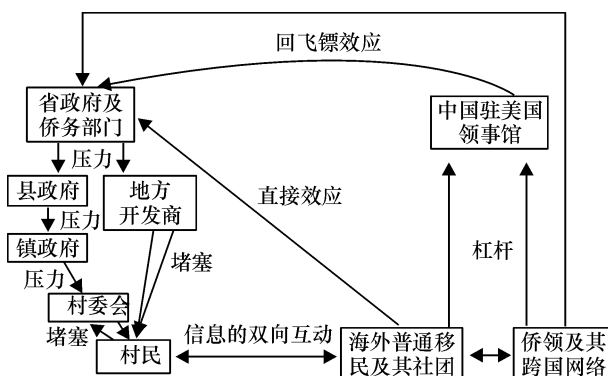


图1 海外移民的“回飞镖”维权模式

在本案例中,国际移民的回飞镖维权模式无论从最初的框架整合到第二阶段的倡议网络跨国化,再到最终阶段的杠杆政治运用,都与在西方语境发展出来的回飞镖模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首先,在维权框架的最初整合阶段,本地动员与海外移民介入的双向互动过程与传统回飞镖模型中主要强调跨国行动者对于运动的单向影响不同。实际上,由于本案例牵涉到多元利益主体成员,海外移民与本地村民在迁坟态度上存在分歧,维权框架的构建最初并不顺利。而后由于本地向上沟通的渠道被堵塞,部分维权成员利用信息政治策略进一步整合维权框架,最终达成基本共识。

其次,在议题重构与倡议网络扩大的阶段,维权成员在运用 NGO 与媒体这两个因素上是谨慎且富于策略性的。在传统的回飞镖模型中,开放的 NGO 和开放的媒体是两个重要的变量(Keck & Sikkink, 1998)。但在本个案中,虽然普通移民最初借助家乡联谊会社团的名义间接向中国驻外领事馆以及直接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但此举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最终对目标行为体形成“杠杆效应”的关键还在于某个侨领在海外华人社区与祖籍地的跨国网络及其影响力。社团只是作为整个维权行动可资利用的“工具箱”,与传统回飞镖模型中 NGO 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相差甚远。虽然媒体是维权者与目标行为体博弈的筹码,而且海外移民为了使跨国倡议网络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确实在纽约华人社区及福州地方小范围地使用了信息政治与象征政治策略,但他们并未将此信息进一步透露给外国媒体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及机构。这种处理方式在典型的“回飞镖”模型中是比较特殊的。不少案例显示了信息的公开化与跨国化的重要性。但深谙中国政治逻辑的维权领导者清楚:要想使己方在最大程度上规避风险并实现利益诉求最大化,就得准确地拿捏“踩线”与“越线”之间的分寸;一旦毫无顾忌地将此议题在海外全部披露和公开,很可能会触犯祖籍国追求政治稳定的底线与影响祖籍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导致事态失控并与祖籍国政府交恶,使诉求得不到网络中强大行为体的支持。但同时,移民身处海外,具有不受制于祖籍国的超脱地位,因此“公诸媒体”仍然成为他们与相关利益主体谈判的重要筹码,这也成为他们能够撬动目标行为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海外移民的杠杆政治之所以能够有效并产生“回飞镖”效应,与中国的政治框架和社会结构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与母国的关系密切相关。祖籍国及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在出现利益分歧时采取安抚策略是基于政治考量的。国家在处理类似集体行动时,往往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超越了经济压力(周飞舟, 2007)。正是国家在政治稳定与经济绩效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张力,为海外移民与政府之间“默契”的达成埋下了伏笔。跨国集体维权的主要领导者在抑制海外反华势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跨国政治支持上均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黎相宜, 2014),他们在给祖籍国的“上访信”中也多次提及这种“爱国爱乡”的“事迹”。对于越来越重视政治合法性而非经济利益的祖籍国政府来说,在经济利益上做出一定

让步而换取移民的持续与坚定的海外政治支持是必要且值得的。

综上所述,在将回飞镖模式用于解释海外移民的跨国集体维权行动中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境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仍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便面对公众的压力,政府也非常有信心处理这些危机(黄岩 2011)。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过度使用媒体与 NGO 的力量,很可能导致维权的失败。从海外移民对于媒体和 NGO 组织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所采取的弹性化策略。其行动从维权的理据、策略的选择到目标的制定都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进行。虽然他们将“保护华侨华人的私有财产”作为抗议主框架,但在与政府、开发商互相博弈的过程中,他们还是策略性地接受经济补偿,并未坚持“绝不迁坟”的最初立场。总体性社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倡议网络要绕过本地政府向上寻求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海外移民之所以能够巧妙地绕过基层政府的压制,很大原因在于他们以海外华侨华人的身份策略性地利用了与祖籍国的政治同盟关系,积极与祖籍国政府沟通,用较为理性、节制的方式达成诉求。

随着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种跨境甚至跨国的倡议网络和行动者,重新考虑在单一民族国家框架内发展出来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但国际移民的作用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中国作为传统的移民输出大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海外移民。这个群体在融入移居地的同时,仍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跨国集体维权活动作为其跨国实践的重要内容,为我们修正与补充以往的社会运动理论与跨国倡议网络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参 考 文 献]

- 董海军. 依势博弈: 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社会, 2010, (5).
- 郭于华.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 读书, 2002, (7).
- 韩召颖, 高婉妮. 论跨国倡议网络的作用——以美国和墨西哥劳工运动合作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7).
- 黄岩. 市民社会、跨国倡议与中国劳动体制转型的新议题——以台兴工人连锁罢工事件为例分析. 开放时代, 2011, (3).
- 黎相宜.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 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社会, 2009, (6).
- 黎相宜. 跨越彼岸: 美国福州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研究. 学术研究, 2014, (4).
- 李连江. 欧博文.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G]. 吴毅, 主编. 乡村中国评论(第3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覃琮.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社会, 2013, (6).
- 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社会学研究, 2004, (2).
- 折晓叶.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 社会学研究, 2008, (3).
-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周飞舟. 生财有道: 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 社会学研究, 2007, (1).
- Armbruster, Ralph. *Glob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Labor Solidarity in the Americas: The Anti-Sweatshop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Snow David A., E. Burke Rochford,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 (4).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Xu, Yi. *Activism Beyond Borders: The Study of Trans-border Anti-sweatshop Campaigns across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PhD Dissertation fro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2.

【责任编辑: 杨海文; 责任校对: 杨海文, 许玉兰】